

2803

7

靖远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8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靖远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三胞联谊委员会编

目 录

忆前甘肃学院院长朱铭心先生·····	于 范 (1)
苏振甲先生·····	张尚瀛 (5)
清庠生王定邦之《四言杂字》·····	陆又赞 (25)
话剧歌剧在靖远·····	师 直 (33)
抗日战争中的靖远抗战剧团·····	张尚瀛 (65)
黄河上的筏子·····	张尚瀛 (77)
解放前靖远农民银行插曲·····	潘明远 (117)

忆前甘肃学院院长

朱 铭 心 先 生

朱铭心（1895—1974）字镜堂，靖远三滩人。早年丧父，寡母与他们兄弟二人相依为命。幼时在家乡读私塾。中学在甘肃省第一中学（即兰州一中）渡过，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26年考入北京研究院攻读教育学、心理学。毕业后，以成绩优异留北师大附中任教。

先生自幼聪慧好学，为人耿介。在北京读书时与李大同、章伯钧等先进人士有往还，不数年而名声大噪，学业渐鸿。1932年受前院长邓春膏先生之聘来甘肃学院任教授兼事务长。1936年由甘肃省府委员会会议通过报教育部批准任命为甘肃学院院长。先生思想进步，一贯反对腐恶的官府，支持地方事业，团结教育界同人与青年学生，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在兰州地区最称敢言，最有威信者之一，深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1932年冬，省财政厅长谭克敏、民政厅长林竞等竟利用职权克扣兰州地区七所中学以上学校教职员工的薪金据为私有，引起广大师生的反对，先生首先撰文登报揭发他们的罪行并组织支持广大师生上街游行，上门索薪、砸毁

了谭、林的住宅。在七校广大师生的压力下，迫使二人退出全体教职工的薪金，并被撤除了所任的职务，师生们取得了这次索薪学潮的胜利。

1932年甘肃学院成立医科，教育部未予批准，1933年甘肃省政府批准成立医学专修科。但省上经费有困难，无法购置设备，由先生亲赴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募款，经过几个月不辞劳苦的跋涉，博得各方积极支持捐赠设备费二万多元（白元）购置了X光机等医疗器材二十多台件，充实了教学设备。

1936年，先生任院长之时，全院有法律科、文史科和医科，附设高中部与一所实验小学。在校大、中、小学生1500多人，其中大专学生500余人，几年内为国家培养大专学生280多人，分赴全国各地，在各个战线上工作。当时大学西医教师甚缺，为了提高西医教学质量，他费尽心机，到处奔波，从张学良部队中聘请来曾到德国留学的西医专家王敬怀任科主任，以加强教学工作，为甘肃培养高质量的西医人才。如尚德岩（临洮）、王焕文（景泰）、拜淑珍（兰州）、赵应极（兰州）等有名的西医大夫。当年先生曾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学习先进的经验以提高教学质量。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猖狂侵华，气焰大为嚣张，

“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华硝烟弥漫华北、平津，而蒋介石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致使国土变色，人民涂炭，先生对此极度愤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启发帮助下，他与爱国人士广泛支持从北京返甘的大学生和兰州大中院校学生之抗战学生组织——青年抗战团，但各校的青年抗战团学生在校很受打击，由先生呼

吁并请教育厅长田炯锦接见青抗战团的负责学生罗伟、魏晋贤等并支持他们下乡宣传抗日救国的行动。先生的这种爱国言行受到了复兴社（特务组织）的反对。1938年初，朱绍良在甘肃掌握党政军大权，复兴社头子教育厅长葛武启在甘肃学院主持三次高级官员会议，不经教育部批准，提出甘院新院长人选，意欲排挤打击先生，想调先生院长职务。先生坚决反对这种卑鄙的手段，学生也拒不接受新来院长，罢课闹学潮，学院一时混乱。特务们便恼羞成怒，挟持先生移地软禁数月之久才释放。后经同人高葆成（临洮人）从敌人内部获取确切消息得知要暗杀先生。这时在兰的进步人士和同乡积极设法使先生离开兰州，才得免被杀害。同人王翰伟（字雄如，靖远人）从冯俊彦家中借白洋200元作路费，趁监视人员熟睡之际护送先生走出兰州，徒步榆中甘草店，二人搭乘汽车逃往西安。到西安后王即返兰。先生经历千辛万苦转赴重庆，先生壮志未酬，从此离开了教育界，另谋生计。

先生到渝后靠出卖文牒度日，生活极度困难，以至于曾把两个男婴放在重庆街上十字路口，被人抱去不明下落。他生活穷困时不忘国家的命运，不忘乡亲，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组织旅渝同乡会，任副会长（会长李世军）裨益家乡不少。同时参加四川的民主运动，参加民主同盟工作，并担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推动抗日民主运动。

先生在重庆时，生活甚困难曾受同乡张宏义的接济帮助，谋取职业，经贺耀组的介绍到汉口第三集团军孙柏瑩的司令部任上校参议，随军到郑州、永川等地抗日前线与日寇作战。1941年经孔祥熙介绍回重庆任粮食部专员，又

被调往中央直接税总署任专员。1945年被调往西安任陕西
区直接税总局副局长（辖西北五省）直至解放。解放前，
先生虽有囊私肥己的良机，却不曾有搜刮民脂民膏，聚敛
私财之行径。1945年秋，在宁夏视察税务工作时，省税务
局长送来大批白洋和法币，几件二毛皮大衣，几条香烟，
被先生拒绝并受到先生的当面训斥，表现了先生清廉从政
的高贵品质。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了。先生留职，任陕西边区政府
税务总局督查室副主任。1950年调回兰州文教处，并任兰
州大学总务长。1952年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为甘肃省检察委
员会委员，1955年以后被选为甘肃政协委员，参加省文史
资料编纂工作。1969年疏散到静宁县。1972年转回故里
——靖远三滩，1974年病逝。

（抄引民盟甘肃省委档案，朱甲口述
魏晋贤、李秀峰、王翰伟补充，于范整理）
1989年10月

苏振甲先生

张 尚 瀛

苏振甲（1900—1970）字鼎三或鼎珊，甘肃省靖远县糜滩乡人。他是甘肃省国民党早期的活动家和中坚人物，也是甘肃合作事业的创始人，同时更是一位地方兴学，培育人才的老园丁。解放后他又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甘肃省委员会。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的统一做贡献。不幸“文革”中遭受迫害，死于他乡（武都）。他的一生为人公正清廉，但遭遇坎坷。在甘肃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有影响的近代人物。但他的平生事迹诸多散失，无系统的详细记载，我是他的不齿学生之一，凭数年来搜得的有关资料和苏先生生前的自述手稿片断，述其一生简要历程如下：

他的家庭概况

苏先生的家在靖远县黄河以北的糜滩乡，绿树成荫，阡陌纵横的农村。他家是世代以农为业的庄稼户。据我所知他有兄弟六人，除苏先生而外，余皆务农，是仅能过日子的一般家庭。1949年由于生计日繁，分居另炊。苏先生家中分居后仅有土房二十余间，棚子八间，县城有院落一处，亦不过十间，蔬食淡饭，生活拮据。其妻李氏勤俭持

家，早晚烧香念佛，终年吃素，是一位忠厚的贤妻良母，生子五人名宰东、宰瀛、宰南、宰西、宰北。这样一大家人，解放前仅有水田18亩，家中的生活靠农业收入和苏先生的薪俸及子媳们的工资维持，虽能勉强生活，但很困难。他在靖远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作校长时，我曾亲聆他的教诲，他诚恳严肃，每天破晓之前，便身先起床，带我们上早操，跑步，教太极拳。给我们上“公民”课时，侃侃而言，对“三民主义”和“法律常识”引经据典讲的头头是道，课堂上我们谁也不敢打盹、看闲书，而是专心听他讲课。他讲课时声音宏亮，多是合起课本讲，同时结合社会情况做比喻，通俗易懂。那时学校初建，在中午休息时，他亲身带着我们拔野草，背垃圾，平操场，顶着烈日，先我们早到，在他的带头下，我们那一个还敢偷懒。他经常身穿一件蓝布长衫和黑布马褂，既不吸烟也很少见他饮酒，脸上很少流露笑容。后来我在社会上工作，曾和他同桌多次吃饭，也不多见他举杯痛饮，头上戴的那顶旧绒礼帽，连前顶也因日久捏破了。他在学校主张“学以致用”和“要作大事，不要作大官”。在他的身教言行影响下，靖远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的学生，养成了一股求实、朴素的校风，为当时社会所赞扬。

他的一生简历

据苏先生自己遗留的一份材料，谈他的经历说：“我毕业于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是个旧职员成份。1928年我经骆力学介绍，在兰州任国民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处政治员兼任政治处训练班的教务员。1929年当

选为国民党甘肃党部执行委员。（按：是1928年12月由甘肃省第二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选为执行委员和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930年在太原阎锡山司令总部政治训练部作训练科长，是同乡朱铭心介绍的，正是阎冯反蒋的时候。1931年到甘肃学院作教员，嗣后又兼甘肃省立第一中学训育主任，又兼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宣传科长，又代理过该会书记长，至1934年离开兰州。拟在靖远创办乡村建设事业，所以任靖远教育局长三年（按此间他还任靖远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校长）。1936年又到兰州任甘肃省教育厅秘书，继又任甘肃学院事务主任（按时朱铭心为甘肃学院院长）。1938年在天水任战时第七教师服务团天水办事处主任，嗣代团长。继调回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任秘书（按当时曾济宽为校长）又被靖远县选为甘肃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又由参议员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参议员。1942年至1947年又到靖远创办县立中学，任校长六年，同时兼任靖远县参议会议长（按1944年3月7日甘肃省府遴选为靖远县参议会议长。1945年4月14日选为国民党六届全会甘肃省第六区初选代表）。1947年4月当选为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监察委员。继又选为甘肃省第一区立法委员（按为1948年2月15日得票232.299票当选）。1948年到南京出席立法院会议。1949年到靖远县立中学任教半年，暑假时病例，从此在家养病。直到1950年7月病稍好，靖远县人民政府约为靖远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同时靖远县立中学聘为教员，未及上课，又接电报列席甘肃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后，因宿疾没有全好，留兰州治疗。至1951

年由孙作宾书记介绍，任民革甘肃分部筹备委员，这是二十多年来服务社会的经过。”这是他亲述的简历，是难得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中1935年7月在靖远期间，他还同万良才、李濡、黑铭等人筹办过“同进消费合作社”，与兰州的“同仁消费合作社”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活动机构。“同进消费合作社”结束后，他又命长子苏宰东开办过“文化服务社”，在糜滩乡办理过“坝滩完全小学”，“糜滩信用合作社”及夜校，识字班等。1951年至1958年“反右”开始前，他一直为民革甘肃省委员会的委员。后遭迫害，下放武都农村劳动，1970年死于武都，由其家人扶柩归里，葬于糜滩乡。

他的政治思想演变过程

苏先生是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摸索着前进的，他虽长期在国民党政治场合中徘徊，但其思想并不属于国民党的顽固派。他之所以被国民党所器重，主要是以其社会声望、道德学问为拉拢的优势条件。即是所谓“只给以名位，而不假以实权”者也。看了上面他的经历，很足以说明问题，这更是他虽有抱负而没有作出一番非凡事业，抱恨于社会的关键。至于他的政治思想演变也是相当复杂而曲折的，兹据他自己所写的材料，录之如下：

“一、社会人事关系：我的舅父杨汝桂是个农人，当我读书时，家境困难，他供给我一切，使我得在法政学院毕业。（按苏在靖远读书时是屈小斋先生的高足，民国七年（1928）毕业于靖远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去兰州投考甘肃省法政专门学校时被录取为榜首）。我的一个患难朋友戚文波，临洮人，解放后进军新疆。当我1929年被离开

兰州时，他愿步行送我到南京。王儒林现任省政府交际处长，那次他帮我离开兰州，解放后又帮我求进步，我住政法学校时，校长施国祯，给我做人方面的影响很大。教员王庚山，对我的思想方面大有影响，他曾借给我许多新书读。万良才现任省委副秘书长，（按已故）我在靖远办乡村事业时他帮忙到底，解放前曾送我许多进步书籍，解放后对我特别照顾，我在靖远时，曾叫岳秀山（按靖远县东湾乡人）写信约我到兰州，我因病不能动，去年我到兰州他多方帮我，给我介绍工作，使我有进步的机会。陈耀山开诊疗所，给我治病，注射了一百多针，未要手续等费。在我困难的时候，有此帮助，真令人难忘。吴瀛仙（按即吴锦州，靖远三滩乡人）甘肃省人民文化馆馆长，我去年到兰州，就住在他家中，他与我相交二十多年，忠厚长者，遇事十分照顾。省统战部的张友三（按即张达文，靖远大庙人）对我十分关怀，使我深切感到共产党对党外人士的帮助热忱。

二、曾参加过的党派和政治活动：我于1925年在北京由骆力学，何履亨介绍加入国民党，入党的动机有二，一因北伐时代的高潮刺激了我；二我当时决心投考黄埔军校，朋友们说要入黄埔军校，最好先加入国民党。我入党后即潜往广州，但黄埔军校负责人言，黄埔那时不招新生，决定在武汉办一分校，北方学生最好到武汉入伍。我听了很赞成，当时就乘船潜赴武汉入了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分校系为政治大队，注重政治训练，那时因为国共合作，同学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我在学校虽然只经过六七个月但所得很多。记得那时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经济概况》、《政治概论》、《社会学大纲》、《国际政治》、《三民主义》等

课程由施存统、陈豹隐、李达、沈雁冰、周佛海等担任。我的一点社会科学常识及革命思想，可以说完全由这短短的几个月中所培养的。可惜北伐完成后，武汉的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邓演达）派我同许青琪，张学騫几个人回甘作农民运动，我从此就离开了学校。

（甲）甘肃省党部执行委员：我们由武汉回甘肃后，时局大变了，宁汉已经分裂，清党已在甘肃开始了。兰州的一般人，认为从武汉来的都是共产党。我们见了省府主席刘郁芬，把所带的宣传品（大部是农民运动、农民问题讨论集）交了，我即回靖远。1928年刘郁芬的政治处长骆力学曾写信给我，约我到兰州来，委我为政治员，以后成立政治训练班，叫我充教务员。我即专门训练学生，准备作军队中的政治及普通党务工作。那时王儒林为该班事务员。对当时情况很清楚（按1928年苏曾随国民军七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处长骆力学为宣传队长，率政治员、省党部干事和总指挥部政治训练班学生混合编成两个宣传队，随军前往河州，“到前方宣传，以欺骗群众，孤立‘土匪’”。见《甘肃文史资料选集》苏振甲‘1928年随军在河州见闻’一文。到1929年春，国民党开甘肃省全省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亲及省党部执监委员。我当选为代表及执行委员，到南京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给我的影响太坏，以前我还有点革命的幻想，这次完全打消了，所以回省之后，言论常露出不满的论调”（根据《甘肃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石琳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活动情况’一文中有此段记载说：‘这次大会还选出了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曾

三省、何履亨、骆力学、苏振甲。1929年二月，曾、何、苏前往南京参加全国代表大会。而骆力学则接受国民军的意见，迟迟未行。当时阎、冯反蒋的军阀战争，已在酝酿期间。全国代表大会也曾一再延期。会后不久，即发生了阎、冯反蒋战争，曾三省、何履亨二人留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工作，苏振甲仍反回了兰州。在第二届执委宣誓就职的大会上，苏振甲曾将南京国民党中央各方面腐化堕落的情况以及大会期间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作了详尽的揭发。因此从第二届执委会成立的一天起，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就同南京国民党中央对立起来，配合国民军进行反蒋活动。苏先生的这种反蒋思想，对他以后的事业起着不可分割的政治因素。(乙)“适逢那年秋季在纪念廖仲恺先生大会上讲出拥护农工利益，效法廖先生革命精神等语，而骆力学认为我宣传三大政策，为共产党张目，由秘密会议中决定开除了我的国民党党籍，密函警察局逮捕严办。我事前得到了消息，即步行逃出了甘肃”(按以上全系抄录苏先生自述稿原文)。

他严格要求自己

苏先生在写他的思想演变过程时说：“我的思想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是小学时代的思想与实际工作没有多大的影响。第二阶段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脑子里装满了“民主”和“科学”的气味。那时正在政法学校读书，学生方面也有小部分爱国运动，始开“五九”国耻纪念会呀，响应“五卅”的大罢工呀，兰州学生曾组织七校学生联合会（因中等以上学校只有七个）我接连任过三四年学生会会长。自

1925年加入国民党后，完全信仰孙中山先生，对孙中山重要著作读得很熟。同时认为同马克思的思想目的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方法。马克思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孙中山则用阶级协调的方法。我个人赞成孙中山的办法。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国共合作，才能达到目的。以后因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我仍本孙中山“青年应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的教言，作一点于人民有益的事。所以我虽然是个法律系的学生，但二十多年来极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服务。大学教员、专门学校教员、中等学校教员以及小学教员都先后当过。另外抗战后所谓“民意”机关的代表，由县参议员、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等我先后都作过。当时也很负责，也很讲廉洁，但劳碌半生，成果很少。最后才明白，在反动统治下，个别人要作好事是办不到的。

他的新人生观

据苏先生自己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写道：“我是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但我却没有得到孙中山继续革命的启示。现时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已经进步了。所谓联俄，已发展到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和平阵线了。所谓联共已发展成为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了。所谓扶助工农，已发展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了。换句话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汇流了。我加入民革，愿本着孙中山不断革命的精神，精研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从今以后我要坚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奋斗。

这件事我也知道不容易，但我要利用学习再学习，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第一步先改造自己，使自己稍为健全。在我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国内存在两种力量，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在反动统治范围内的人，既与革命力量没有联系，又不想完全脱离反动的束缚。在现在看来，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所以我以前的努力，若拿革命的观点来批判，都是反动的，“往者不可鉴，来者犹可追。”今后只有痛加洗除，过去之我譬如昨日死，今日之我，譬如今日生，将来如何？全靠自己努力了”。

苏先生这些真挚的出于肺腑之言和他的立场和人生观的转变，都在他参加民革后，筹备甘肃民革组织去永登县参加土改工作团，勤勤恳恳的工作中兑现了。尤其在他受株连，被打成“右派”遭受折磨后，却始终相信中国共产党，毫无怨言，直至身死他乡，表现了“今日生”和“全靠自己努力的”精神。以得到新生的曙光，保全了晚节。

他的一椿危险遭遇

关于苏先生1929年在兰州的一次险遭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暗杀的事件，是甘肃近代一些人士们共所周知的一件大事，是苏先生进步思想和行动的具体表现。据《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石琳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活动情况”一文中说：“1929年冯、阎反蒋战争暴发，由于国民军在甘肃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在马仲英叛乱后，又挑起凉州马廷襄的叛乱，弄的全省赤地千里，死亡枕藉。因此人们希望在战争中国民军失败，而对蒋介石存在很大幻想。甘肃省党部是一个甘肃籍人最多的机

构，有国民党中央党校毕业的张友骅，杨作荣、康闻之等人，为蒋介石捧场，从事宣传鼓吹，更使一般人想往蒋介石，厌弃国民军。当时骆力学认为有机可乘，便于1929年6、7月间，邀请苏振甲、张友骅、李钺、任冠军、潘镇、王升荣、杨作荣、石琳、王慨儒、徐振麟等人，在骆的家中吃饭会谈。任冠军原属田昆山一派，自宁夏返兰后，转入民众联合处（杨继高任处长）当主任，后来到南京去活动，田昆山不大理会，任于此时，便倒在骆力学的一方。饭后骆力学说：“国民军不得人心，民怨沸腾，战争结局，中央不会失败。我们迫于情势，反蒋非出本心，应该与中央设法联系，免得以后没有出路，大家意见如何？请详加研究，以便同心协力，报效党国。”当时许多人都表示赞成，没有一个提出异议。并主张早想办法，行动起来。张友骅还批评过去工作说：“私心自用，不够公正，因而有些怨言，希望以后注意。”骆也表示接受，并提出“国民军控制严密，对任何人不得透露一字。否则，每个人的身家性命，必将难保，即使个人遭受意外，亦绝不出卖朋友，牵连任何人。”大家都同意把这一条作为纪律，并一致在骆家孙总理像前，各自提出严峻的誓词。当天谈到深夜始散。大家比以前融洽的多了，骆也很高兴，认为这样下去，自己的领导就会巩固起来，而以前不大满意骆的人，也希望把不愉快的局面，从此扭转过来。但是过了不几天，省执委会召开紧急会议，以苏振甲有参加共产党的嫌疑，作出了‘开除党籍，逮捕讯办’的决议。当日夜间在军警前往党务训练所实行逮捕之前，苏振甲得到兰州市党部候补委员苏耀江的电话，当即躲避在兰州师范学校教师司瑞如

家中，连夜由戚文波陪同逃出兰州走了。在这件事中，骆还利用杨作荣的作用，草拟了一个罗致苏振甲罪名的文件，发表了出来，混淆人们的视闻。而杨作荣亦因此代替了苏振甲的宣传部长和甘肃民国日报社社长的职务。据事后了解：骆力学给苏振甲下毒手的原因，主要是苏在党务训练所中极为活跃，对于受训学员影响较大，骆认为苏有独树一帜的企图，早想借故排除；同时苏振甲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归来，骆怀疑他被当时在南京的田昆山拉走了，因此下决心把苏撵走。”

又据当时亲知此事，在党务训练班学习的靖远县人陆又执回忆：“1929年，苏振甲先生由南京归来，成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左派代表人物，在是年8月纪念廖仲凯先生的大会上，苏先生登上讲台曾讲：‘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不能废，否则便失去了工农运动的意义。……’徐振麟（字祥民，是当时兰州市党部的执委会常委）接着也登台讲了类似的话。会后特务任冠军和骆力学等背着苏振甲召开了省党部执委会，说：‘苏振甲公开讲三大政策，为共产党张目。……’秘密决定开除他的党籍，马上逮捕法办。会后立刻派国民军的执法队去小沟头党务训练所（即旧兰州织呢局）逮捕苏先生。但事为在甘肃民国日报社工作的苏耀江所侦知，马上向党务训练所挂电话，叫苏立刻躲避，电话由党务训练所事务主任王儒林接到，并由队长王升荣转告了苏先生。事在燃眉，刻不容缓，苏在大家关怀劝说下，转到隔壁甘肃省立兰州师范学校同乡高风谦（字益斋，当时任该校会计）处暂避风头。苏先生离校不久，执法队荷枪实弹，马上到了训练